

白氏諷諫

[唐]白居易撰



白氏祖諫

[附錄] 白氏祖諫

白氏諷諫

〔唐〕白居易撰

中華書局

白氏諷諫

〔唐〕白居易撰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商務印書館上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耗1/32·1 3/4印張·23,000字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5,600 定價：(7) 0.20元

統一書號：10018.121 58.12. 覆型

前言

白居易是中唐時代的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一生寫了一百七十多首諷諭詩，專門揭露當時政治社會的種種黑暗和腐敗，反映人民的災難和痛苦，來諷諭統治者設法改良政治。這些詩篇，具有強烈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新樂府』五十首是其中最為傑出的一組詩篇。

唐帝國經過安史之亂，元氣大傷，一蹶不振，國勢由強大變為衰弱，一直走下坡路。國內許多地方被藩鎮割據，不服從中央命令，經常與中央發生戰爭，戰禍綿延。對外由于軍事力量削弱，邊防不鞏固，引起外族經常入侵。西北方的吐蕃、回紇，西南方的南詔，侵擾更是頻繁，使人民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由于藩鎮割據，收不到地方的賦稅，戰爭頻繁，軍費開支浩大，中央財政非常困難。唐帝國的統治者在這種情況下，沒有能够奮發圖強，改變局面。中央大權常常操在貪婪殘暴的宦官和自私無能的官僚手裏，政治黑暗腐敗。統治階級一方面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一方面加緊對人民的經濟剝削，造成土地愈益集中，階級矛盾愈來愈尖銳。

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寫作於唐憲宗（李純）元和四年（公元八〇九年），其內容大多數

是反映憲宗元和初年和德宗（李适）時代的時事的。德宗時代，藩鎮非常跋扈。當時成德、魏博、淄青、山南東道四節度使聯合起來反抗王朝，史稱『四鎮之亂』。不久淮西節度使也參加叛亂。叛軍勢力很強，軍鋒西指，長安告急。涇原節度使率兵赴援，兵士因軍餉太差，發生叛變，德宗逃到奉天（今陝西乾縣）避難。叛軍推朱泚為首領，圍攻奉天。泚自號大秦皇帝。後來唐將李晟等擊滅朱泚，收復長安，才初步轉危為安。同時四鎮、淮西等藩鎮內部分裂，互相搏鬥，才解除了對中央的威脅。此後藩鎮叛亂仍此起彼伏。叛軍所至之處，虐殺人民，劫掠財產，造成深重災難。

德宗時代中央政府的政治非常黑暗腐敗。德宗信用宦官和奸臣。叫宦官竇文場、霍仙鳴擔任神策軍護軍中尉（禁軍主帥）官職，將神策兵擴充到十五萬人。宦官掌握禁軍大權，愈益專橫，仗勢欺壓百姓。又信用盧杞、裴延齡等奸臣，結果政治腐敗，言路不通。『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樸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往抑塞。』（元稹『敍詩寄樂天書』）德宗為人，性貪喜財，刻意聚斂。在奉天設瓊林大盈兩庫，專藏地方進貢的物品。地方官吏為了巴結皇帝，加重剝削人民，進貢物品超過規定賦稅，名為『羨餘物』。對善於剝削的官吏，更是非常信任，往往提拔官位。統治階級的生活非常奢侈，人民血汗的結晶品，被他們任意糟蹋。物品享用

不完，腐爛在倉庫中。

德宗死，順宗（李誦）立。因病在位不到一年即傳位于憲宗。憲宗初年，即白居易寫作『新樂府』的時期，繼承的是德宗時代形成的殘破局面。據元和二年官方統計，當時除割據的藩鎮不計，全國輸稅的戶口只及玄宗天寶年間的四分之一。財政困難情況可以想見。（見『舊唐書』

『憲宗紀』

白居易在青少年時代，因為北方藩鎮叛亂，戰亂綿延，家庭離散。他跟着父親到過現在江蘇、浙江、湖北等地。後來父親死了，又到江西依靠哥哥。這種不安定的生活使他容易體會到社會的動盪和人民的苦難。貞元十六年（八〇〇）他廿九歲時，考中了進士，之後開始在中央政府擔任官職。這時他的生活經驗愈益豐富，文學修養愈益提高。他深深感到政治社會的弊病，文學作品必須發揮積極戰鬥作用，促進政治社會的改變；君主必須重視反映人民生活、思想情感的歌謠，加以搜採，作改革政治的參考；詩人必須以敘寫時事，諷諭君主改革政治為自己的任務。在元和初年所寫的『策林』中明顯地表現了這種主張：

古之爲文者，上以紐王教，繫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于詩人美刺之間焉。（第六八目議文章）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採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諭之興，日採於下，歲獻于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

（第六九目補察時政）

元和三年（八〇八），白居易在中央擔任左拾遺官職。當時憲宗頗注意刷新政治，提拔了一批賢臣擔任重要職務。左拾遺的職務是『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唐六典）。白居易在這一階段行動非常積極，努力履行諫官職務，在不少問題上向憲宗諫諍，同時以詩歌爲武器，寫下了一百多首光輝的諷諭詩。在『新樂府序』中，他說明自己的創作目的是『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這和『元九書』中所提出的『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都是表明他的創作主張的最精警的語句。

白居易的耿直作風，觸怒了憲宗和舊官僚，更爲宦官所切齒痛恨，元和十年（八一五），他遭受貶謫，被逐出中央朝廷，從此結束了寫作諷諭詩的生活。白居易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受的是儒家正統的教育，他雖然非常不滿當時的黑暗現實，但時代和階級的限制，使他不可能根本懷疑封建制度本身和最高封建統治者皇帝的地位；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賢君賢臣的統治上面。現實是殘酷的，他的希望落了空，遭遇了斥逐的命運。但必須指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白居

易的文學主張與其實踐是非常進步的，在古代現實主義的文學理論中更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實踐這種主張的諷諭詩，也永垂着不朽的光輝。

二

『新樂府』五十首內容大抵反映貞元、元和時期的政治社會情況，內容很廣泛豐富，本文不能作很全面細緻的分析，只能扼要的介紹一下。詩的內容着重揭露當時政治社會的弊病，反映了尖銳的階級對立：一方面是統治階級的荒淫無恥，一方面是廣大人民的深重苦難。這些詩篇的現實主義精神最爲強烈，這是首先值得注意的。

貴族的奢侈腐敗的生活，在詩中有多方面的反映。『紅線毯』、『繚綾』寫人民化費無數人力物力，製成珍貴織品，獻給宮廷享用，甚至被任意糟蹋。『馴犀』、『驃國樂』諷刺帝王賞愛外國的貢物。『杏爲梁』寫大官僚的居宅窮極奢侈。『兩朱閣』寫貴族迷信佛教，長安城內佛寺衆多，侵佔廣大民地。『牡丹芳』寫貴族賞玩牡丹花，如醉如狂，糜費厲害。『胡旋女』諷刺玄宗迷戀楊妃，寵幸祿山，招致禍亂。『李夫人』、『隋堤柳』、『八駿圖』、『草茫茫』諸篇，以前代史事爲題材，諷刺帝皇的沉溺女色、遊幸和厚葬。白居易不但廣泛地揭露了統治階級的種種荒淫無恥的醜相，而且表現出強烈的憎恨，在『紅線毯』結尾，他憤怒地喊着：『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

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在『兩朱閣』結尾，他尖銳抨擊佛寺侵佔民地說：『帝子昇仙作梵宮，漸恐人家盡爲寺。』這類詩篇，和『秦中吟』十首中的『傷宅』、『輕肥』、『歌舞』、『買花』諸篇合看，可收相得益彰的效果。

着重描寫人民痛苦的也有好多篇。『杜陵叟』寫天時大旱，莊稼不收，官吏還是強迫人民照納租稅。『賣炭翁』寫宮廷宦官以很少的織品，強迫換取賣炭翁千餘斤的炭，揭露『宮市』對人民的強盜式的掠奪。『折臂翁』寫人民爲了避免喪身於黠武戰爭，斷臂求生。『縛戎人』寫淪陷吐蕃的人民，熱愛祖國，冒死逃回，邊疆官吏不問情由，縛起來當外國俘虜，以邀功賞。這類詩篇中有一部分專門反映婦女的痛苦。如『上陽白髮人』、『陵園妾』寫宮女幽閉宮中、青春寂寞的苦悶。『母別子』寫將軍喜新厭舊，遺棄故妻，造成母子生離的悲劇。『井底引銀瓶』寫少女爲男子誘騙的悲劇。這類詩篇中充滿了人民的辛酸血淚，貫注了作者的豐富同情，藝術描寫也最爲生動精警。『杜陵叟』說：『奪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這麼赤裸裸的嚴厲責罵官吏們的語句，在古代詩人的作品中是極少見的。詩人的態度如此激切，無怪乎要招致統治者的憤怒和打擊了。

『新樂府』中有一部分詩篇反映了唐皇朝和外族的關係，也有深刻的思想內容。如『西涼伎』

寫安史亂後，西鄙涼州長期爲吐蕃侵佔，邊疆將吏不能收復失地，却貪看涼州來的雜戲，毫不想到自己的責任，詩人對這種現象是很憤慨的。『城鹽州』篇結尾指出一些邊疆將吏爲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養寇縱敵，無視國家、人民的安全，語意也很痛切。安史亂中，回紇因助唐平亂有功之後非常驕橫，經常向唐朝無理勒索財物。每年送來數萬匹馬跟唐朝交換絲織品，一匹馬易絹或縑數十匹。馬多了毫無用處，但唐朝爲了和回紇妥協，只能加緊剝削人民，用絲織品換下來。詩中『陰山道』一篇，即描寫這一史實。這類詩篇都反映了唐代中葉國勢衰弱遭受外族侵略的現象，同時表現了作者感時傷事的愛國主義精神。

白居易在新樂府中不但對種種黑暗腐敗的現象作了尖銳的諷刺和抨擊，同時也對一些美好的現象作了贊美和謳歌。在『七德舞』中，贊美了唐太宗的愛護人民、信用賢臣等種種善政。『昆明春』贊美德宗開放長安昆明池，讓人民捕漁採薪的開明措施。『城鹽州』贊美德宗在鹽州築邊城，有力地防禦了吐蕃的侵擾。『驪宮高』贊美憲宗愛惜人力物力，不去驪山行宮遊幸。『牡丹芳』除諷刺貴族們的奢侈風尚外，還贊美了憲宗關心農桑。除此以外，對賢臣也作了歌頌。『道州民』歌頌道州刺史陽城廢除當地進貢矮民的舊制，使百姓不致有骨肉生離之苦。『青石』歌頌了對國家忠心耿耿、剛直不屈，爲軍閥朱泚、李希烈害死的兩位賢臣段秀實和顏真卿。從

這些詩篇，可以看出白居易所贊美謳歌的是愛人民、愛國家的人，或者是對人民、國家有實際利益的舉動，儘管他的尺度，還不能完全超越儒家的倫理準則。這種贊美，說明了詩人贊美什麼，同時也就是反對什麼；對這一方面的贊美，就是對另一方面的諷喻：這是可以體會到的。

封建君主主要治理好國家，必須依靠賢臣的合作。白居易對這一點是非常重視的。在『七德舞』中，他贊美太宗尊信賢臣。在『行路難』中，他用丈夫遺棄妻子的事實來諷諭近代君主不能信用忠臣，慨嘆着『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的悲劇。他不但要求君主信用賢臣，而且要求臣子忠於君國。在『司天台』、『紫毫筆』、『採詩官』諸篇中，他有力地抨擊了居官者不能克盡職責，特別是像太史、御史等有諫諍責任的官吏。『秦吉了』更以舌端很巧的能言鳥秦吉了不能發揮作用來借諷言事之官的失職。白居易認為官吏們把政治社會的種種弊病告訴皇帝是推動政治改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不但以此嚴格要求言事之官，而且自己以許多實際行動（包括寫作諷諭詩在內）實踐着這種主張。

在新樂府中，有若干篇專門談音樂的詩作：法曲、立部伎、華原磬、五弦彈。內容大抵慨歎雅樂不被重視，通俗音樂和外國音樂盛行。古代儒家認為音樂與政治相通，和平的雅樂為穎異的俗樂外樂勢力所壓倒，是政治混亂的一種象徵。白居易在這些詩篇中表現的對音樂的看法，

沒有能擺脫這種傳統思想的束縛。

從上面粗略的敘述，可以看出偉大詩人白居易在『新樂府』中表現了他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崇高思想。他尖銳地暴露、抨擊了統治階級荒淫無恥的生活，他們對人民的殘酷剝削，他們對祖國命運的漠不關心。他以充滿同情的文筆，反映了廣大人民掙扎在水深火熱中的苦難。他一方面對黑暗現實作了有力的諷刺，一方面也對正直的人士和善政作了適當的歌頌，有『美』有『刺』，並且力圖以是否符合於人民和國家的利益，作為美刺的標準。這種思想無疑是非常進步的。由於時代和階級所形成的思想限制，白居易在其積極的政治主張方面，只能把理想寄託在聖主和賢臣的合作上面；在暴露、抨擊黑暗政治方面，詩人的矛頭常常指向奸邪、貪暴或者不稱職的官吏，較少直接指斥居於最高統治地位的君主，當然，他更沒有能力把這些醜惡的現象作為封建統治階級、封建剝削制度的本質問題來加以抨擊。在『井底引銀瓶』中，詩人對那位被損害的弱女子寄予豐富的同情，但小序中卻說了『止淫奔也』那樣迂腐的話。所有這些，都表明地主階級立場和儒家正統思想在詩人身上留下了顯明的烙印。

三

『新樂府』五十首的結構很嚴密，藝術描寫非常優秀，富有獨創性和感染力量。

五十首有一篇總序，闡明創作意圖，每篇題名下有小序，分別說明各篇的主旨。這種體例是摹倣『毛詩』全書有大序，各篇有小序的寫法。白居易非常推崇『詩經』通過美刺比興密切聯系現實的精神，自覺地以『詩經』爲學習對象，這種學習不但表現在美刺的內容上，而且表現在體例上。

五十首的次序，大致是按照時代排列的。據陳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證稿』的考證，自『七德舞』至『海漫漫』四篇寫唐開國到玄宗時事，自『立部伎』至『折臂翁』五篇寫玄宗時事，自『太行路』至『縛戎人』十一篇寫德宗時事，自『驪宮高』以下三十篇大抵寫憲宗時事。全詩以『七德舞』爲首，敘述唐代開國君主太宗的功德，表現了儒家陳述祖宗功業垂誡子孫的正統思想；其中強調指出太宗熱愛人民、尊信賢臣的優點，實際就是詩人所追求的進步政治的標本，爲全詩樹立了正面的典範，恰好與後面的荒淫無恥、虐害人民的作爲諷刺對象的政治成爲鮮明的對照。最後一篇『採詩官』明確指出君主應該搜採歌謠，了解民情，改良政治，諷刺了當時官吏緘口不敢諫諍的現象。『採詩官』前面兩篇是『秦吉了』和『鴉九劍』，前者諷諭言官失職，後者表明自己在政治上要像『鴉九劍』一般，決開浮雲，使君主的恩澤能够普照萬物，二詩在內容上跟『採詩官』互相補充，清楚地說明了自己的創作主張和寫作新樂府的目的。由此可見，全篇在開頭和

結尾的安排上是具有深意的。

『新樂府』五十首跟『秦中吟』十首一樣都是敘事詩，對各種社會現象進行客觀的具體的描繪。敘事體是古代樂府歌詩的一個優良傳統，漢樂府中的許多優秀民歌，漢末建安詩人的不少樂府詩作，都用敘事體來深刻地反映了時代面貌和人民的苦難。到唐代，偉大詩人杜甫繼承了這種優秀傳統，更打破了過去作家沿襲樂府舊題寫作的束縛，根據詩的新內容命題，做到『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元稹『樂府古題序』）。『兵車行』、『麗人行』、『哀江頭』、『悲陳陶』、『三吏』、『三別』等就是這方面的傑出作品。白居易和他的詩友元稹、李紳等學習了杜甫的這種寫作方法，把這種詩喚作新樂府或樂府新題，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漢樂府民歌和建安作家的敘事詩篇，常常能以樸素的語言、白描的手法來描寫人物和故事，通過對於人物的行動、言語、心理的具體深刻的刻劃，創造了鮮明的人物形象，對讀者產生強大的感染力量。白居易的『新樂府』也繼承了這個優點，像『上陽人』、『折臂翁』、『縛戎人』、『杜陵叟』、『賣炭翁』、『母別子』等最膾炙人口的篇什，都以具體細膩的描繪，把血淋淋的事實像圖畫一樣展示在讀者眼前，獲得震撼人心的藝術效果。『新樂府』五十篇中所描寫的社會現實，大抵都有具體史實為依據，所以白居易自稱『其事覈而實』（新樂府序）。由於詩人往往能够選擇

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深刻的社會意義的題材，而在描寫時又能不受個別史實細節的束縛，而以植根於豐富生活體驗基礎上的想像來加以補充和概括，因此許多篇什并不僅是個別生活現象的記錄，而具有非常深刻的典型意義。跟元稹的『樂府新題』相較，白居易的『新樂府』在敘事上更有一個優秀特點，那就是每篇集中寫一件事，主題單純，內容明白，不似元稹詩作一題多事，使讀者感到頭緒紛繁，主旨不明。

『新樂府』中主要是對社會現實的客觀描繪，但其中也包含不少主觀議論的成份。這時候，作者不是通過具體事實來表現自己對生活的態度而是直接站出來來說話了。這時候作者的感情往往更激動，禁不住要大聲疾呼，『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新樂府序）這種議論成份常常出現在各篇的結尾，所謂『卒章顯其志』（新樂府序），企圖通過它來點明全篇的主旨。這種議論性的結尾有時很精警，如『海漫漫』、『兩朱閣』、『西涼伎』、『紅線毯』、『母別子』等，都能做到使內容更豐富、諷諭更深刻，更有力地鞭撻了黑暗腐敗的現實。但也有一部分結尾，如『胡旋女』、『折臂翁』、『杏為梁』、『隋堤路』等，則顯得僵硬枯燥而流於概念化，使人感到索然寡味，不能獲得反覆玩味的愉快。還有一部分詩作，如『法曲』、『二王後』、『華原磬』、『紫毫筆』、『天可度』等，幾乎是全篇直接抒發議論，缺少具體生動的形象。這種詩篇一般都比較概念化，藝術價值就要

低得多。

白居易詩歌的語言以通俗淺顯著稱，故世有『老嫗都解』的傳說。這種特點在新樂府也表現得很明顯，無論敘事議論，都是這樣。『新樂府序』說：『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可見他有意識地要寫得通俗淺顯，使讀者容易了解他所反映的種種問題，達到他的宣傳教育的目的。他所採用通俗淺顯的形式是完全爲內容服務的。這種語言使白詩具有很優越的明朗性，在描寫的具體生動以及激動人心方面起着很大的積極作用。當然有一小部分缺乏精鍊概括而過於淺露，使人不能反覆玩味，也不能不說是缺點。在句式方面，『新樂府』顯得更活潑、更多變化，他常採用三言七言間錯起來的方式，有時還有五言、九言等句式，充分發揮了樂府長歌縱橫開合的優點。三七言間錯的體式，在古樂府舞曲歌辭和唐代變文俗曲中是比較多見的，白居易吸收了它們的優點，自由大膽地運用，獲得優異的成績。在用韻方面，各篇常不是一韻到底，而是屢次換韻，這使得聲韻不呆板而多變化，增強了詩歌的音樂性。它跟通俗流利的詞句相結合，構成了『其體順而律』（新樂府序）的特點。

總上所說，白居易創作『新樂府』，能够選擇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來予以真實地反映，在體製、表現手法和語言運用等方面，又吸收了詩經、古樂府以至杜甫、唐代民間歌曲的經驗，